

# 离散文学《远山淡影》的后殖民解读

朱舒然

(中共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 北京 100091)

**摘要:** 离散本质上是一个深刻的后殖民议题。以后殖民研究中的多个视角解读离散文学《远山淡影》,能够更好地分析离散主体在不断变化的地理、政治、文化背景下对其身份认知的心理变化,以及离散经历折射出的不同文化观与世界观。通过对西方的凝视、东方的沉默和文化杂合等后殖民研究中关键性问题的讨论发现,正确认识与接纳文化杂合是重塑离散主体文化身份的关键,对离散中“他者”和二元对立的解构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远山淡影》;离散文学;后殖民主义;西方的凝视;东方的沉默;文化杂合

**中图分类号:** I56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04(2018)05-0116-04

过去的几十年间,国际移民问题和离散问题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位置的政治”和与之相关的后殖民议题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诸多离散文学作家中,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是近年来文坛不可绕过的著名作家之一。《远山淡影》作为石黑一雄的第一部小说,是亚洲离散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后殖民研究的关键议题,例如西方的凝视、东方的沉默与文化杂合,在亚洲离散文学的背景下有着独特而深刻的应用。

## 一、离散与后殖民

对于“离散”这个概念的正确理解必须对 diaspora 一词进行追根溯源。diaspora 来源于希腊语的两个词根:dia(通过、穿过)与 speirein(使分散、散开)。韦氏词典中将 diaspora 一词解释为人们从家乡或祖辈居住地分散、移民到其他地方的行为,而大写的 Diaspora 则特指巴比伦流亡后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以外地区定居的行为。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强调了一种“从某处分散”的概念,而这个“某处”正是离散的中心,一个家或一个起点。离散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则是“迁移”,但并非所有的迁移都能被定义为离散。有些自相矛盾的是,离散的迁移,其核心是为了再次安定、安顿下来,在别处重新扎根。

《远山淡影》的作者石黑一雄的一生可谓“离散”的一生。他六岁随父母移居英国,此后在英国生活并成长。他的小说涉及战争、悬疑、科技等多种主题,场景与人设也各不相同,而“记忆”则是其作品一以贯之的线索。《远山淡影》的故事情节也正是由女主人公——移居英国的日本寡妇悦子——的记忆推动的,

讲述了日本民众战后恢复与重建新生活的愿望与行动。故事随着她的回忆不断展开:悦子带着女儿景子移居英国后,与她的英国丈夫生下了小女儿妮基,而景子也变得越发的孤僻与离群索居,并最终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悦子在对其先前在日本生活的回忆中,不断提及一位名叫佐知子的朋友,是一位打算带着女儿万里子追随一名美国军人去往美国的单身母亲。整本书贯穿着悦子模糊与不可靠的记忆,直到故事的末尾悦子才摘下了她的面具,读者进而明白了悦子把自己伪装成故事中所描述的佐知子,是以叙述他人故事的方式来淡化离散经历中的创伤与负罪感。

近代学者不乏对离散的思考和争辩。印度学者拉达克里希南(R. Radhakrishnan)在《关于离散的沉思》一书中把离散的位置定义为“连字符的空间”。由于人们与其所处地理位置的关系不断发展演变,因此这个连字符的空间不仅紧密连结了一个人的过去与现在,还集中体现了一个人现居地与“原生地”之间的身份政治[1](Pxiii)。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离散的存在昭示着一种人的时空错置。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高塔姆·普莱纳斯教授(Gautam Premnath)却认为,对于离散的后殖民研究正在渐渐脱离“世俗批评”的立场。“世俗批评”这一概念是由美籍巴勒斯坦裔的后殖民研究泰斗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提出的。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把世俗批评定义为一种介于文化与制度之间的立场,这种立场意在承认并揭露政治判断、道德判断与社会判断的具体现实[2](P26)。这要求人们关注问题

收稿日期:2017-12-10

作者简介:朱舒然(1992-),女,河南郑州人,中共中央党校2016级哲学专业博士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培养博士生。

的世俗性和现实性,注重文化产品产生的政治背景、道德背景和社会背景。另外,普莱纳斯教授抨击了拉达克里希南提出的“离散中的人口迁移是促成后殖民性的必要条件”这一观点,认为这已经完全背离了赛义德在世俗批评中强调过的“位置的政治”[3](P61)。然而,普莱纳斯教授也承认,离散在本质上促成了对过去狭隘的地域观的超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全球公民的空间”[3](P60-61)。

在后殖民研究的视域下,除了承认新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真实存在,我们更要进一步关注离散群体的主体性。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关注离散问题及离散文学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它不仅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主要问题与特征,还架起了一座连接过去与现在、故乡与他乡之间的桥梁。Halleh Ghorashi在《穆斯林在西方世界的离散》一书中指出,离散作为一种纽带,创造了一个可以打破边界、超越差异的“空间”。而这个空间给人以产生共情、倾听他人、挑战成见、探索新知的机会,这也正是实现话语权平等的必经之路[4](P215)。而离散文学作为表达观点之媒介,承载着离散作者的情感与思考。这也进一步阐明了离散文学在创造这一“空间”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建设性作用。与罗兰·巴特的“作者不在场”“作者已死”和福柯派的“作者被消解,而作者功能被显现”等观点不同的是,笔者认为在离散文学中这一情况恰恰相反。通常来说,无论是在其现居地还是在原生地,离散作者的地位与现状都充满争议,也正是如此,导致了他们在表达自我时会受到诸多限制。因此,离散文学的存在本身也正是其进一步表述情感、发挥主体性的重要途径。可以说,离散文学是离散作者“在场”的重要证明。

作为后殖民研究的重要来源和媒介,我们可以从多个视角来研究和解读离散的后殖民含义。笔者将从后殖民研究中的几个重要议题出发,分析离散文本《远山淡影》所呈现的主人公对其身份认知的心理变化及离散经历折射出的不同文化观与世界观。这些议题包括爱德华·赛义德提出的“凝视”、美籍印度裔文学批评家盖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提出的“沉默的他者”以及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提出的“文化杂合”。

## 二、东方主义与西方的凝视

“凝视”这一概念是由赛义德在其《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出的。这本书通过对大量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文学的分析,详细论证了东方主义的话语理论,是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奠基之作,标志着后殖民理论的系统化和成熟。赛义德在文中尖锐地指出:“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是人为构建起来的。因此,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存在。”[5](P6-7)在这

一对峙中,西方通过对东方的“描述、教授、殖民、统治”[5](P4)等,显然占有了权威性与中心性。赛义德也在书中详述了20世纪东方主义的话语理论,他强调这是一种对东方与西方人为构建起的二元对立,其中西方被普遍认为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而东方则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5](P49),从而得出了西方优于东方这一毋庸置疑的“真理”。这种霸权主义的区分轻而易举地建立起了一条假象中的边界,以先验主义二分法将东方与西方进行区分——西方对东方的再现与重构并非建立在经验主义的证据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种东方主义的政治视角,即扩大熟悉的东西(欧洲、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东西(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5](P54)。在假想中的边界与世界中,拥有强势地位的西方享有一切特权与自由,它可以对东方进行任意的阐述、塑造与构建,而这一过程也正是西方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价值标准来“审视”或“凝视”东方的过程[6](P3)。

《远山淡影》开篇就以一种激烈而极端的方式呈现出了西方的凝视。小说的开端清楚地交代了景子的自杀,这也构成了整个故事的背景与基础。景子作为随母亲悦子一起移居英国的女儿,是文本中重要的离散主体之一。而她的自杀,是西方对东方强势凝视下的产物,也正是东西方二元对立集中爆发的体现。离散的过程让景子不仅经历了地理上的错置,更重要的是经历了情感与心理上的错置。不仅如此,景子死后英国媒体进行报道时漠然的态度——“和妮基不同,景子是纯血统的日本人,不止一家报纸马上就发现了这个事实。英国人有一个奇特的想法,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天生爱自杀,好像无需多解释;因为这就是他们报导的全部内容:她是个日本人,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杀。”[7](P4-5)也能让人看出,在英国社会的“凝视”下,日本文化长久以来一直是被看做扭曲的、不正常的。

文中的叙述者强调英国人发明了“自杀是日本人的天性”这一观点,并且在媒体看来,一个血统纯正的日本人死在了她英国的家里,单是这两条信息放在一起就足够具有新闻价值了。这样的对比被媒体用来呈现自杀的效果,然而笔者却以为,它更应被看做景子自杀的起因。景子的自杀,可以被解读为对其身份意识的坚持,或者说,是对民族同化与种族主义的抗争。从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来看,自杀这样一个比喻也是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海外移民,甚至石黑一雄本人都选择使用的一种突出民族特征的手段。在《远山淡影》一书中,石黑一雄也正是用了“自杀”这一关键概念从本质上区分了东方和西方。在这个语境下的“自杀”,已经不仅仅是西方对东方的一种残忍的凝视,更是东方(以东方主义的方式)面对西方时的应激反应,一种自我选择的、突出“异域性”的表现。美籍土耳其裔历史学家

阿里夫·德里克 (Arif Dirlik) 就这一问题曾对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提出过新的补充:“从一开始,亚洲人本身就参与了对东方这一概念的构建,因此东方主义理应被看做亚洲的现代性问题之一。”[9](P96)他认为亚洲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到了“自我东方化”这一浪潮当中,因此对东方主义的研究还应该把亚洲人的参与和观点考虑在内。

### 三、东方:沉默的他者

美籍印度裔学者盖亚特里·斯皮瓦克曾掷地有声地问过:“属下能说话吗?”诚然,在后殖民语境中,东方作为被凝视的“他者”,常常处于一种沉默与失语的状态。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女性主义者、解构主义者,斯皮瓦克特别关注西方所谓的身份优越性导致其具有权威话语权的现况。基于本质主义和弗洛伊德思想,她在论文集《在他者的世界》中总结讨论了目前对“他者”的浪漫化、虚幻化的趋势,并且力劝后殖民理论家与政治改革者把第三世界当做社会转型的根源。她最突出的贡献可谓开创了后殖民女性主义——在其著名的《属下能说话吗?》这篇文章中,斯皮瓦克通过分析印度的传统习俗“寡妇陪葬”和西方女性为作者的文本,揭示了西方对东方的强制性而又充满优越感的话语灌输。在殖民主义与男权主义的双重压制下,属下妇女显然成了沉默的主体,不存在受种族与性别歧视的属下主体可以说话的空间,即“属下不能说话”[10](P89)。后殖民女性主义致力于以女性为切入点,对抗与抨击西方世界对于东方的文化帝国主义与殖民霸权。

在《远山淡影》中,东方的沉默首先体现在家庭教育中母亲的失语,面对在英国出生、成长的女儿妮基,或者说,面对一个纯正的英国女孩,悦子东方式的关爱与教育被彻底拒之门外。为了缓和妮基的情绪,悦子最终选择了妥协:“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妮基,我笑了下说:‘没必要生这么大的气,你当然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7](P234)一个失落的、失语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事实上,悦子的失语与沉默,也正是东方文化的失语与沉默,悦子的妥协,也正是处在强势西方文化中东方文化显示出的自卑与退让。

除了家庭教育,东方的沉默还体现在学校教育和信仰方面。文中悦子的公公、一名退休教师绪方先生曾哀叹道:“多年来,我们有一套自己精心建立并热爱的体系。美国人来了,不假思索的把这套体系废除了,粉碎掉。”[7](P79)他反对新一代日本青少年对美式民主的遵循,并且,当看到其早年的一位学生抨击日本传统教育模式时,他感到十分震惊与心痛:“现在的学校太奇怪了,他们教给孩子的为人处世之道太奇怪了。……纪律,忠诚,从前是这些东西把日本人团结在一起。……人们都有一种责任感。对自己的家庭,对上级,对国家。可是现在人们不再讲这些了,而是讲什么

民主。”[7](P79)他认为美国人无法理解日本人的处世之道。美国的方法也许很适合美国人,却根本不适合日本。但后来,他却被自己曾经的学生狠狠地上了一课:“您那个时候,老师教给日本的孩子可怕的东西。他们学到的是最具破坏力的谎言。最糟糕的是,老师教他们不能看、不能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会卷入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7](P188)文中,这一幕师生对峙的结局是老师哑口无言地站在原地,久久没有离开,一定程度上也再次印证了东西方文化对峙的过程中东方文化的失语。文本发生的背景事件是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而这颗原子弹的投下,不仅给日本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肉体创伤,更深层且无法湮没的是心理创伤,或者说是心理上的剧变甚至混乱。它瓦解了日本社会长久以来尊崇和秉承的价值标准,也带来了两代人之间的分歧与纷争。绪方先生在学生面前的沉默也集中体现了日本传统道德观、教育观、亲缘观在新一代年轻人中的衰退。

### 四、文化杂合:中间人与第三种空间

“国际文化的概念形成,并非建立在文化多样性之上,也不是突出多元文化论中的异国文化,而是建立在对文化杂合的清晰认识与深刻感知之上。”[11](P33)著名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在其《文化的定位》一书中曾这么说。深受后结构主义和赛义德思想的影响,霍米·巴巴分析了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相互建立主体性等议题,探索了重塑现有话语权体系的方法,评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中的不同道路。作为霍米·巴巴思想理论的基石,“文化杂合”这一关键概念是指由殖民行为导致的,并随后带来的一系列文化、语言、意识形态间的碰撞与交融。通过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西方与东方、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等二元对立的消解,霍米·巴巴提出了学术新语“中间人”和他们所处于的“第三空间”。他认为,任何文化与文化体系的存在都是建立在一个叫做“第三空间”的地方,这个空间“承载着文化的含义”[11](P56)。身份认同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与争议的地方逐渐显露出来。这也是“他者”与“自我”交汇之处,是消解东西方二元对立的关键。对于经历了巨大的地理、心理与社会环境变化的离散群体来说,对“文化杂合”这一概念的正确认识与接纳是重塑其文化身份的前提,也是在离散过程中保持民族精神同时又不至于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关键。

另外,在《逆写帝国》一书中作者也曾提出,在后殖民的情境中,“一个积极有效的自我意识可能会被两种事物侵袭”。第一种是“由于移民、被奴役、流放或因契约劳工而导致的颠沛流离”,第二种是文化诋毁,也就是指“由于‘公认’存在更优等的种族模式或文化模式,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原生文化施加压迫或诋毁的行为”[12](P9)。的确,在《远山淡影》中可以找到诸多自我

意识缺失与文化诋毁的痕迹。例如,悦子在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女儿之后,坚持要给她起一个“纯正英文”的英文名,不希望和日本有任何关系,这一举动清楚地揭示了她诋毁原生文化的态度。悦子口中所描述的佐知子——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过去的她自己——努力地学习英语,甚至在还没有踏足美国时就表现出对这片土地强烈的渴望:“我小时候就曾经梦想有一天我会去美国,去那里变成电影明星……要是把英语学好了,很容易就能成为一个女商人。我以前很喜欢学英语。”[7](P138)佐知子还曾多次表示“美国更适合女孩子成长。在那里,她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她可以成为女商人。她也可以进大学学画画,然后成为一个艺术家。所有这些事情在美国要容易得多。日本不适合女孩子成长。在这里她能有什么指望呢?”[7](P220)可见,无论是地理上的远离故土还是心理上的抽离原生文化,都证明了离散过程导致的严重的文化诋毁与自我意识缺失。

C. S. 路易斯曾坦言:“如果你不能克服被排除在外的恐惧感,你将永远都是一个圈外人。”[13](P5)尽管排除万难来到了英国,定居多年并努力消除隔阂,然而真正融入英国文化一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女儿景子的自杀让悦子彻底幻灭了。也许并不是因为作为移民的她们不被接受或者无法融入当地社会,最重要的可能是她与女儿都身载“文化杂合”这一特殊印记,而合理对待这个特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正如前文所提到的,景子自杀后英国媒体报道的漠然使她在经历了女儿的死之后再次感受到了难以逾越的文化隔阂。她也坦言,自己的英国丈夫虽然发表过诸多有关日本的

独到见解,但他从没能真正理解日本文化。渐渐地,悦子意识到这个让她曾经厌恶到选择逃离的文化与她的灵魂有着不可磨灭的深刻联系。生存在这样一个尴尬的“连字符的空间”,又被类似“我究竟是谁”的问题不断困扰,悦子开始思考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小说结尾,当妮基说她不想让生活固定下来也不想生孩子的时候,悦子的那份怀旧、那份对日本传统价值观的认同感一涌而上——“日本传统的生活方式一点也不坏”[7](P236)。这也证明了她以自己的方式找到了自己的“家”。在离散经历中,通过对其文化身份的不断反思,悦子终于认同并接纳了这样一种文化杂合,存在于她身上的非此即彼的文化二元对立因此得到了消解。

## 五、结语

“流亡令人不可思议地使你不得不想到它,但经历起来又是十分可怕的。它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也无法克服的。虽然文学和历史包括流亡生活中的种种英雄的、浪漫的、光荣的甚至胜利的故事,但这些充其量只是旨在克服与亲友隔离所导致的巨大悲伤的一些努力。流亡的成果将永远因为所留下的某种丧失而变得黯然失色。”[14](P173)赛义德在二十年前就承认了离散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失去与伤痕。诚然,在目前“西方的凝视、东方的沉默”的离散背景下,离散主体在不同的地理、政治、文化环境中对其身份认知产生了心理剧变。本文通过对《远山淡影》这一离散文学的后殖民解读,强调了正确认识与接纳文化杂合是重塑离散主体文化身份的关键,对离散中“他者”和二元对立的解构具有重大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Radhakrishnan, R. *Diasporic Mediations: Between Home and Location* [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 [2]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Random House), 1993.
- [3] Premnath, Gautam. *Remembering Fanon, Decolonizing Diaspora* [J]. *Essays and Studies*. London, 2000.
- [4] Ghorashi, H. *Muslim Diaspora in the West: Negotiating Gender, Home and Belong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 [5]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M] Penguin Books, 2003.
- [6] 罗世平. 凝视:后殖民主义文学折射[J]. *国外文学* 2006, (4).
- [7] 石黑一雄. *远山淡影* [M]. 张晓意,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8] 肖淳端. 解读《酸甜》的错置书写[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10).
- [9] Dirlik, Arif.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J]. *History and Theory*, 1996.
- [10] 于文秀. 斯皮瓦克和她的后殖民女权主义批评[J]. *求是学刊* 2005, (4).
- [11] Bhaba, Homi K. *The Location Cultur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12] Ashcroft, Bill,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M]. London: Routledge, 2002.
- [13] Lewis, Clive Staples. *The Inner Ring* [M]. Logres Press, 1966.
- [14] Said, Edward W.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责任编辑 乔学杰)